

村岡先生：為二戰中遭日本侵略國家義務講學

李衛峰

村岡先生 2003 年從荷蘭萊頓大學榮休後，每年奉獻出十分之一的時間和精力，免費為二戰中遭受日軍蹂躪的亞洲各國講學，昭示世人日本還有願意認真反思歷史的學者，以此彌補日本戰爭罪行所造成的傷害。目前他和夫人的行迹已踏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韓國、泰國、緬甸、菲律賓和新加坡。

在瀏覽比較閃語（comparative Semitics）的學術文獻時，我已經習慣了在腳注和尾注里看到的德國、法國、英國、美國、以色列等國學者的姓名。此時，如果能突然看到一位東亞人的姓名，那是多么令人興奮的事情。“Muraoka, Takamitsu”，就是我碰上的第一個這樣的姓名。於是，我试着搜索了一下這個名字，“村岡崇光”四個日本漢字在屏幕上出現了。英文維基不但列出了這位先生的學術著作，還列出了先生從萊頓大學榮休後為二戰中遭受日軍侵略的亞洲國家免費講學的義舉。當我再次用“村岡崇光”這四個簡體字搜索後，發現有關先生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報道，和 2008 年他在華東師大講學的消息。我看到後，頓時覺得有必要請這位先生來上外講學，為中國的閃語研究指點迷津。

後來通過芝加哥大學張泓瑋同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張纓老師牽線搭橋，2016 年，我和村岡先生建立了直接的郵件聯繫。我力邀他 2017 年來上外講學，他回信說 2016 年他已在山東大學講學，2017 年他已經答應到馬尼拉的一家學院講學，要看 2018 年的安排了。我回信時告知，我在敝邑《寶山縣地名志》里發現了朱蔣宅的全部蔣姓村民遭日軍殺害，而我外祖母的舅父正是此次屠殺的遇難者之一，先生立即回信深表哀痛，希望親臨現場，並立即應允 2018 年來上外開講古典敘利亞語。此後如約來滬，待學術活動一結束，村岡夫婦就參觀了寶山區羅店鎮的朱蔣宅、陳伯吹中學的紅十字紀念碑、羅涇鎮的侵華日軍羅涇大燒殺遇難同胞紀念碑。村岡先生在參觀過程中兩次下跪，並向紅十字紀念碑獻花。

村岡先生時隔兩年將第三次來中國講學，消息傳開後，復旦大學、華東師大、上海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

學、山東大學的學者、學生紛紛來信，或報名參加課程，或邀請先生前往他們高校作講座，或詢問賓館住址屆時登門問候。甚至還有一位泰國教師、一位日本媒體人亦致信要求參加課程，最終由於各種原因未能成行。

3 月 18 日，我在浦東機場接到了精神矍鑠的村岡先生和桂子夫人。20 日起，每周二、四在本校開講“古典敘利亞語”課程。來自上外、復旦、華師大、上大、上師大、上海社科院、芝加哥大學、倫敦政經學院的 14 名學員參加了此次課程。碰巧的是，在先生講學期間，以色列巴伊蘭大學的 Michael Sokoloff 教授也在上海度假。一時間兩位閃語界大牛齊聚申城。

村岡先生一再談起自己對日軍戰爭罪行的認識。他在離開日本前，對二戰的認識與普通日本人相差無幾。1970 年在曼徹斯特大學教書期間，有一晚看了《桂河大橋》，引發了他對日軍二戰罪行的深究。利用業餘時間，先生翻閱了大量此類著作，並且將其中一些書翻成日文，以此警醒他的同胞勿忘戰爭暴行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其中由他從荷蘭文翻成日文，講述荷蘭慰安婦的譯著《折斷的花》一書的中文版，將於今年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發行。談話期間，他說到悲慘情節時，幾度眼眶濕潤，語帶哽咽。他說道：“我為日本在 1945 年以前所做的和 1945 年以後沒有做到的（指反省侵略戰爭）深感羞愧！”

先生在 2003 年榮休後，每年奉獻出十分之一的時間和精力，免費為二戰中遭受日軍蹂躪的亞洲各國講學，昭示世人日本還有願意認真反思歷史的學者，以此彌補日本戰爭罪行所造成的傷害。目前他和夫人的行迹已踏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韓國、泰國、緬甸、菲律賓和新加坡。



村岡先生在離開日本前，對二戰的認識與普通日本人相差無幾。1970 年在曼徹斯特大學教書期間，有一晚看了《桂河大橋》，引發了他對日軍二戰罪行的深究，利用業餘時間，翻閱了大量此類著作，並且將其中一些書翻成日文，以此警醒他的同胞勿忘戰爭暴行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圖為 2016 年村岡先生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時留影。圖片自該紀念館網站。

村岡先生的講學都是義務免費的。我們在幫他辦理各項事宜的時候，他都堅持自己付費。我為他們準備瓶裝水的時候，桂子夫人會笑瞇瞇地從手提包里拿出一瓶水，說：“Thank you! But we can share the water.” 在高铁上，村岡先生堅持要走到餐車自己購買便當。在北大作講座前，他婉拒了同學們游覽頤和園的邀請，他說他不是來旅遊的。每當此時，我只能在心底默默敬佩和感謝！

村岡先生是國際知名的閃語專家和聖經七十士譯本專家，村岡先生於去年榮獲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聖經研究 Burkitt 獎章，成為獲得該獎的第一位亞洲學者。課程開始後，先生首先用五個小時講解完敘利亞語語法，然後開始讀文獻。文獻大部分是聖經別西大（Peshitta）譯本。讓我這個外語出身的人，極致體驗了一回語文學界和歷史學界的古典語言教學模式。在對某種語言有了鳥瞰式的了解後，直接做文獻轉寫、朗讀和翻譯等訓練，以此加深印象，激發自我探索。他還為學員們录制了 40 多分鐘的課文錄音。

村岡先生在講課中，投影上始終放着希伯來語聖經的原文，經常比較兩個版本的細微差別。閃語研究既需要博大的宏觀視角，又需要精細的微觀操作。別西大譯本是《聖經》的第一個全譯本，現今存世最早的聖經原文抄本反而要比它晚八九百年，別西大譯本所依據的原文可能更為古老，因此別西大譯本意義非凡。在幾次比較後，先生才點明：在版本比較時，the more difficult, the better。較古老的版本總是趨向於用較為複雜的語法，而後來人更願意用經過簡化的文字。這就是他的看家本領——文本對勘。

村岡先生的自我定義是語言學家，他在授課中經常在我們較為熟悉的英語、日語乃至漢語中找例子，把理論語言學應用到文本闡釋中去。為了解釋他對敘利亞語中 schwa（靜音）的理解，他講起他女兒的一段經歷。他女兒生長在英國，家庭中只用英語交流。她小學時父母帶她回日本，一個月後她就可以日常交流了。在從希思羅機場到家的路上，村岡先生想考考她，問她いか

（ika）倒過來怎麼念。她女兒的回答是かい（kai）而不是英語母語者的回答あき（aki）。這說明，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音系規則，敘利亞語中在我們看來很難讀的音位搭配，在母語者口中卻是很自然的。

在我學習現代希伯來語的過程中，對希伯來語中愛玩失蹤、變身的元音十分頭痛。在第一節課上，當我聽到村岡先生講到的西北閃語的元音刪除規則（vowel deletion rule）後，頓覺眼前一亮，多年的難題終於有了解決途徑。由此也想到，在我國，理論語言學和實際的外語教學脫節嚴重，外語一線教師由於不熟悉語言學理論，把很多語法現象歸納成不規則現象，生造出了許多讓語言學家瞠目的術語。另一方面，語言學家又大多出身中文系和英文系，缺少多語種語料來發現新規則和佐證理論假設。而村岡先生說語言學家的作用就是 minimize the irregularities（把不規則現象最少化）。

中國的閃語古典語言研究起步很晚，以世界史學